



中國共產黨黨史 學習參考材料

第二輯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黨史學習參考材料

• 第二輯 •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中國共產黨黨史學習參考材料
(第二輯)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文出字第1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383·787×1092耗 1/2 · 23 印張 · 47,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60,113 定價：一角九分

編者的話

為了配合理論學習初級組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學習，我們編輯了這套“中國共產黨黨史學習參考材料”。

第二輯，選輯了有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這一時期的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原發表時間較早，內容上可能有不盡妥善之處，而由於配合學習任務較急，有的文章沒有來得及請作者修改，這是要向作者致歉並向讀者說明的。

一九五五年八月

目 錄

毛主席發展地運用丁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學說 梁維直 (1)
——讀“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够存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紅軍 荣孟源 (12)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國蘇維埃

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 蓋·培·愛倫堡 (24)

毛主席發展地運用了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學說

——讀“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梁維直

列寧、斯大林根據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確立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學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最光輝的發展之一。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正處於平穩上升的階段時，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數先進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但在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已轉入帝國主義階段，情況起了變化，這個論斷已經不適合了。列寧根據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把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而加以分析，並得出結論說：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論歐洲聯邦口號”）

列寧不但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而且還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同時勝利的不可能，他在“無產階級革命

底軍事綱領”一文中寫道：

“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

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尙企圖抓住馬克思那個陳舊公式，來反對列寧的革命學說。列寧曾尖銳地抨擊道：

“夢想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就等於把社會主義拖延到無期，換句話說，假如以為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革命能够在一切國家同時爆發，這樣的想法，就等於一般地拒絕革命。”（列寧：“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

斯大林發展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學說，斯大林同志指出：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就是：一些國家跳過另一些國家，一些國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國家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軍事衝突和戰爭災禍的方式週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衝突加深和加劇起來，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削弱，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突破這條戰線，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時代，發生了兩種新情況：第一是帝國主義時期，世界已經分割完畢。第二是資本主義各國躍進式的發展，就產生了各國發展水平的並齊化，這種情況是過去所沒有的。即是說，過去落後的國家，現在已經超過

了先進的國家；這就意味着許多國家的力量，變成差不多一樣了。在世界已經分割完畢的情況下，某些新興的國家為了要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就必然要引起帝國主義的相互衝突和戰爭，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必然會使某些國家被削弱，而造成資本主義鎖鏈上薄弱的環節，這個薄弱的環節便是最易於破裂和最便於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方。所以，斯大林談到革命將在那裏開始的時候說：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份較多的地方。”“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那個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那個國家，也許會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我們看一看近三十年來世界革命歷史的進程，是完全依照着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在前進的，而且革命的事實百分之百地證實了這一真理的正確性。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提出了“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中，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理論，這在被壓迫民族國家的解放運動中，是一個嶄新的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沒有提出過的問題，而毛主席則是根據了中國的

國情，把列寧、斯大林這一革命論的原理光輝地運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實踐中來，完整地制定了適合自己國情的革命戰略與策略。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在堅持井岡山的鬥爭中，革命正處於極度困難的時期（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有的同志提出來：“井岡山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問題在當時來說“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毛主席就精闢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解答了這個問題。毛主席認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種奇怪現象的產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只能產生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下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是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而，就會產生中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極度不平衡性，也就會產生中國革命的極度不平衡性。這就是說：“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圍白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情況已有變化，請參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註七。（見“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第五九頁）

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毛主席這種光輝的革命理論，很顯然是把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作了光輝的運用和發展了。

在這裏，我們要來深刻的體會毛主席這種極其英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我們就應該進一步來認識一下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中國是一個工業非常落後的國家，但，却又是一個工業非常集中的國家。工業的落後性，可從農業與工業生產的比重中看出：農業生產約佔全國總生產的百分之九十，而工業生產只佔百分之十左右，在這百分之十的工業生產中，手工業生產又佔百分之八十，而機器業生產只佔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中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是如何的微弱。但，另方面，中國的工業又是非常集中的，據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零年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調查報告：在一、二五二家工廠中，有三分之二——即八二七家工廠是設在四個大城市，即上海六四五個，無錫一一〇個，漢口三八個，大連三四個，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工廠分佈在江蘇、遼寧、河北、廣東、山東、湖北等六省。這六省面積只佔全國百分之十，人口只佔百分之三十六。再從工人集中的情況來看：在抗戰前單就上海一地來說，就集中了全國產業工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這中間在有五百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做工的工人，中國廠方面，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七弱；外國廠方面，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九十六強。這種工人集中的程度，與俄國革命前夕在五百人以上工廠做工的工人只佔百分

之五十四比較，則是超過了的。就拿俄國革命前工業很發達的美國來說，在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做工的工人，也只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二。

有上述的兩種原因，就必然會產生下面的兩種結果：第一，由於中國工業的非常落後和發展極不平衡，在全國廣大地區中，或者很少，或者幾乎完全沒有新式工業。因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直接統治勢力就很少達到，或者幾乎沒有達到，這就會造成在某些地區，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勢力極薄弱的環節。因此，中國革命勢力，就可能經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在敵人力量較薄弱的一定地區或一定鄉村中，首先取得勝利，和能夠長期堅持。第二，由於中國工人階級這樣高度的集中，這就造成了中國工人階級有特別強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工人階級一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後，就最英勇、最頑強和最革命地領導和參加了中國的政治活動；很快就成立了一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武裝起來了的中國共產黨，並且組織了在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所以，它就成了全國政治生活中最偉大的力量，它就應該而且能够來領導中國革命，一直走向勝利。

但，另方面，中國又是一個極端落後的農業國度，從農業人口與工業和其他人口比較看，農業人口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這與英國農業人口佔百分之七、美國佔百分之二十六、德國佔百分之三十一、法國佔百分之四十二、日本佔百分之五十五、革命前的俄國佔百分之七十七比較，均超過甚遠，就以印

度的百分之七十二來說，也超過很大。再從土地佔有關係來看：根據毛主席“農村調查”中與國調查的數字，地主富農人口僅百分之六，却佔有土地百分之八十；而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中貧農，只佔百分之二十的土地。這就造成土地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和土地經營的極度分散。所以，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在極端散漫的、落後的、細碎的小農生產方式下經營着，這就意味着，中國廣大的農村經濟還存在着相當大的獨立性，在這樣帶有相當大獨立性的農村裏，中國革命勢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就有足够的存在餘地和迴旋餘地，正如毛主席所說：“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同時，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便可以在散漫和落後的農村條件下，長期堅持革命並用農村來包圍城市，直到奪取城市取得全國革命勝利。

其次，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與經濟情況分不開的當時中國的政治情況，由於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間接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帝國主義本身的尖銳矛盾，就必然會產生帝國主義者之間在中國的尖銳矛盾。並因而會加深中國內部的各種矛盾。由於帝國主義國內矛盾日益加深，就更迫使他們要來爭奪與擴大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他們就更要拚命來扶植一個或幾個軍閥，通過他們來進行掠奪，這就表現為中國內部的長期軍閥混戰。帝國主義為了便於掠奪中國的主權和傾銷軍火，更有計劃的來製造中國內戰，有時扶甲以倒乙，有時又扶乙以倒甲。而各軍閥之間，為了要獨霸和壟斷一個地方，就必然要投向和依靠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他們既反對

別人來侵佔自己的地盤，又要去擴大自己的地盤，他們就在帝國主義指使與扶植之下，進行了長期不絕的內戰。自民國元年以來，有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江浙戰爭，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以及四川軍閥的長期混戰等等，都可以說明這個情況，這就造成了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軍閥與軍閥之間，軍閥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尖銳矛盾。正由於長期的內戰，必然引起軍閥的橫征暴斂，而加重廣大人民的嚴重負擔，這又擴大了民族資本家與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這種種矛盾匯合起來，就造成了推進全國走向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有了上面的情況，也就必然會產生下面兩種情況：第一、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既然是這樣的激烈化，所以，他們就不可能形成一個稍為長期的反革命統一戰線，那末，革命勢力就有可能在反革命之間的空隙中長期存在和發展。第二、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既然如此深重，那末革命勢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就可以把農民作為最可靠的同盟軍，所以，革命勢力就可以長期的在農村中堅持和發展下去。

根據上面的分析，毛主席就斷定着：中國革命由於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就必須在農村中堅持各種鬥爭。所以，革命就不可能很快的贏得勝利，它必然是帶着長期性、艱苦性和殘酷性的。所以，毛主席既反對“左”傾冒動主義急於去奪取大城市，希望革命很快勝利的速勝觀點；又反對右傾取消主義對革命表示悲觀失望的情緒。同時，毛主席分析了上述情況後，又

得出結論說：

“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毛主席又指出：

“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很顯然的，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的土地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建立和堅持革命根據地這三個問題就成為當時革命的主要內容。因為在中國約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業人口中，就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農民只佔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而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則佔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這一顛倒現象若不從土地革命中扭轉過來，則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這個真理，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然而，若沒有革命的武裝，就不能保障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陳獨秀否認農民革命和放棄了武裝鬥爭，就使許多地方的農民運動歸於失敗，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反過來說，有了武裝，若

不與土地革命相結合，也會使武裝鬥爭陷於失敗，南昌起義後紅軍沒有與農民運動相結合，以致革命武裝受到嚴重的挫折，這是另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是，有了革命武裝與土地革命相結合的內容而沒有革命根據地，那末武裝就會成為流寇式的武裝，就不能堅持土地革命與鞏固土地革命，就容易受到敵人襲擊，使革命有遭受失敗的危險，正如賀龍同志在“回憶‘八一’南昌起義”一文中所說：“我們當時對於創造革命根據地與進行長期游擊戰爭的思想與認識十分微弱，所以，南昌起義的軍隊，沒有與湘、贛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南下向廣東進發……因而南昌起義的部隊大部遭受損失”。所以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革命根據地這三個問題是緊密的結合着，不能絲毫分開的，這三方面的總概念，根據毛主席的說法，就是“工農武裝割據”的概念，也就是紅色政權之建立與堅持的概念，但紅色政權之建立與堅持，是有一定條件的，毛主席提出了五個條件，屬於我們主觀方面的是：全國革命形勢之不斷向前發展；相當力量之正式紅軍的存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黨的組織的有力量和黨的政策之正確性。即是說必須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去加強土地革命以發動羣衆，加強武裝鬥爭來創造和壯大紅軍，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

上述這些，就是毛主席把列寧主義的革命論，精深地運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問題上來，經過了對於具體情

況的深刻分析，得出了關於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極大不平衡性以及由此產生的革命發展的極大不平衡性，革命有利用敵人弱點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性和建立長期的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的結論。這一系列完整的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就是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問題相結合的最高典範之一。我們黨在毛主席正確的領導下，堅持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及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贏得了今天全國革命的勝利，不但解放了中國人民，而且給予東方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以極大鼓舞，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勝利。毛主席這個“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能够長期地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和學說，是應當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寶庫中的新的東西，它不僅指導着中國革命走向勝利，而且已成為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指導原理，這是用不着懷疑的問題了。

（原載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長江日報”）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的中國紅軍

榮 孟 源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毛主席指示我們說：“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三十年的革命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世界革命導師斯大林指明：“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毛主席曾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意見。不過，“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特別是一九二七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實行了